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劳动力 价格动态趋同研究*

杜建军 孙 君

【摘 要】文章对 1980~2011 年不同时期的劳动力价格趋同情况分别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980~1987 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与城镇劳动力工资的差距较大;1988~1994 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超过了城镇劳动力工资;1995~2003 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与城镇劳动力工资的差距逐渐扩大,尤其是 1998 年以后工资差距迅速加大;2004~2011 年,二者的差距又开始逐步缩小,并有逐步动态趋同的趋势,虽然趋同的速度总体上不是很快,但有加速的趋势。

【关键词】农村转移劳动力 价格扭曲 价格趋同

【作 者】杜建军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孙君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上涨逐步加快。有学者认为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城镇劳动力之间已出现了工资趋同现象。由于工资微调不能带动劳动供给的微调,劳动力市场长期难以出清,劳动供给也可能会短缺,中国近年来出现了农民工工资上涨与用工短缺并存的现象(丁守海,2011)。从不同群体之间的工资比较看,劳动力市场上已出现了系统的工资趋同现象(蔡昉、都阳,2011;约翰·奈特等,2011)。目前已有研究主要侧重于探讨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的上涨,但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城镇劳动力价格趋同趋势关注的不够,更缺少对劳动力价格趋同状况进行系统的考察。由于中国经济主要依赖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驱动的投资出口型增长,因此,有必要对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的动态趋同情况进行系统研究。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对劳动力价格趋同进行分析,并进行实证检验。

一、理论分析框架

(一) 农村劳动力市场

农村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主体是农村现有劳动力和新增劳动力,其需求主要包括第一产

* 本研究为 2012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要素歧视、经济溢出与可持续发展”(编号:71203129)的阶段性成果。

业从业者、农村非农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和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依据托达罗劳动力转移模型,人口流动过程是人们对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而不是实际收入差异做出的反应,只要在迁移计划期内的预期城市收入净现值超过农村收入的净现值,迁移决策就是理性的。农村现有和新增劳动力依据预期收入差异选择留在农村或进入城市非正规劳动力市场,1991和2010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比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高出1 759元和15 621元,1991~2010年二者收入差距的年增长率为12.18%,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非正规部门工作是理性决策。此外,部分农村新增劳动力中能力较强者优先通过考入大学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从图1可以看出,40岁以下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从1991年的9 146万人减少到2010年6 392万人^①,年均降低1.88%;从农村人口数量变化上看,农村人口增速从1991年的11.71%急剧降低到2011年的-21.71%,从1996年开始,农村人口绝对数量开始逐年减少。

(二) 城市非正规劳动力市场

城市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主体主要包括城镇私营企业、个体企业、外资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外包项目,供给主体主要包括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户籍)低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大学毕业生。一些城镇低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大学生由于其人力资本禀赋较高,绝大多数进入高端行业;而农村转移劳动力由于人力资本禀赋较低,绝大多数只能进入低端行业,只有极少数通过继续学习和经验技术积累实现向上流动,进入城市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中的高端行业,他们人数虽少,却在一定程度上拉高了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工资水平。

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从1991年的5 032万人增长到2002年的20 333万人,年均增速约为13.55%,但2002年之后其增速放缓,2010年仅增长到24 223万人,年均增速约为1.96%;1991~2010年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年均增速约为8.62%。其中,城镇私营、个体和“三资”企业从业人数从1991年的925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12 361万人,年均增速约为14.62%;建筑业和制造业的从业人数从1991年的1 608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8 481万人,年均增速约为9.15%。城镇私营、个体和“三资”企业需求人数年均增速远大于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的年均增速;建筑业和制造业需求人数年均增速也大于2002年以后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的年均增速(见图1)。因此,从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供求分析,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加速上升是必然的趋势。

(三) 城市正规劳动力市场

城市正规劳动力市场供给主体主要包括城镇原有非农劳动力、毕业大学生和通过其他途径加入城镇户籍的农村劳动力。需求主体主要包括国有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由于城镇非农劳动力数据难以获得,本文用城镇非农人口来近似代替城镇非农劳动力。从供给的角度分析,由于城镇的扩张和大学毕业生数量的激增,城镇非农劳动力从1991

^① 本文用农村总人口减去农村从业人数,再减去农村生源大学生人数得到农村剩余人口数量,然后采用20~40岁农村剩余劳动力为潜在可转移劳动力,由此得到40岁以下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

年的 24 418 万人增长到 2010 年的 45 964 万人,年均增速约为 3.39%。其中,城市正规劳动力市场供给的一个主要来源毕业生从 1991 年的 62 万人增长到 2010 年的 716 万人,年均增长 13.74%。从城镇劳动力需求的角度看,国有单位从业人数从 1991 年的 10 664 万人降低到 2010 年的 6 516 万人,年均降速约为 2.56%;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从业人数从 1991 年的 4 472 万人降低到 2010 年的 1 836 万人,年均降速约为 4.58%(见图 2)。国有单位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需求人数不断下降,而城镇非农劳动力的供给却稳步增长。因此,从城镇非农劳动力数量的供求趋势看,城镇非农劳动力的价格增速放缓是必然的。然而,由于部分低技能的城镇非农劳动力和大学生转向城市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中的高端行业、劳动力价格刚性和城镇生活成本的持续增长,城镇非农劳动力的价格仍将保持较为缓慢的增长。

(四) 价格趋同分析

尽管 1991~2010 年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供求都保持了一定的增长,但由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需求增速较快,所以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如图 3 所示,由 D_1 大幅右移到 D_2 ;然而,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供给增速却相对较小,所以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供给曲线由 S_1 小幅右移到 S_2 ,因此,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供求均衡点由 A 点移到 B 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由 W_1 大幅上升到 W_2 。同期城镇非农劳动力的供给稳步增长,因此,如图 4 所示,城镇非

农劳动力的供给曲线由 S_3 较大幅度右移到 S_4 ;城镇非农劳动力的需求是逐步下降的,其需求曲线应该由 D_3 小幅左移到 D_4 ,但由于城市正规劳动力市场无法为不断增长的城镇非农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一部分低学历、低技能的城镇非农劳动力和低技能的大学生只能转向城市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中的高端行业和职业,这部分人的就业市场与少数高技能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市场重叠,这样,就整体拉低了城镇非农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并使得城镇非农劳动力的需求曲线由 D_3 小幅右移到 D_5 ,最终城镇非农劳动力的供求均衡点由 C 点移到 E 点,其工资水平由 W_3 小幅上升到 W_4 。总之,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及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原因,导致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工资大幅上升和城镇非农劳动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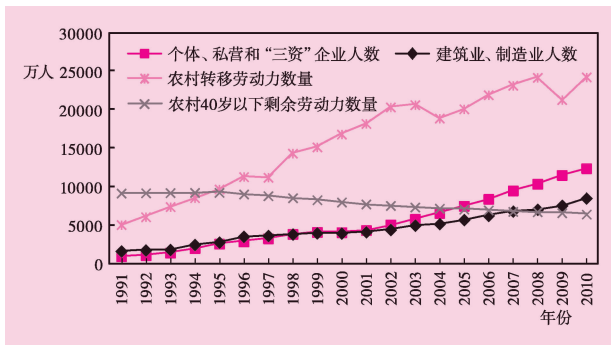


图 1 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供求走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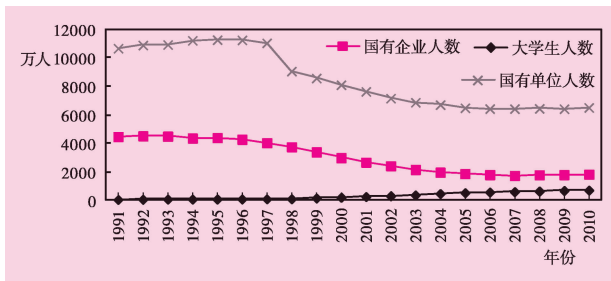


图 2 城镇非农劳动力数量的供求走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工资小幅上升并开始逐步动态趋同。

二、模型构建

(一) 基本假设

本文构建一个简单的生产约束下效用最大化模型考察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和城镇劳动力工资的关系。假设国民经济存在城市生产部门和农业生产部门两个部门,城市部门使用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要素,劳动力包括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城镇劳动力,生产各种工业品;农业部门使用资本和农业劳动力,生产各种农产品。农村转移劳动者、城镇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作为理性消费者追求收入约束下消费者效用最大化。

(二) 生产函数和行为主体效用函数

本文使用的生产函数为: $Y_i=A_iK_i^{\beta_i}L_i^{1-\beta_i}$, $i=1,2$, 分别表示城市和农业部门。 Y_i 、 A_i 、 K_i 和 L_i 分别表示城市部门或农业部门的产出、技术进步、投入要素资本和劳动(包括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城镇劳动力), β_i 和 $1-\beta_i$ 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效用函数为: $U_j=\max y_{c_j}^{\alpha_j}y_{a_j}^{1-\alpha_j}$ st: $p_c y_{c_j}+p_A y_{a_j}=w_j$, $j=1,2,3$, 分别表示农村转移劳动者、城镇劳动者、农业劳动者。 U_j 、 y_{c_j} 、 y_{a_j} 、 p_c 、 p_A 和 w_j 分别表示三类劳动者消费的效用、工业品产出、农产品产出、工业品价格、农产品价格和工资收入, α_j 和 $1-\alpha_j$ 表示消费份额。

(三) 市场均衡分析

城镇劳动者的消费效用最大化问题的拉格朗日函数为: $L=y_{c_2}^{\alpha_2}y_{a_2}^{1-\alpha_2}+\lambda(w_c-p_c y_{c_2}+p_A y_{a_2})$, 分别求偏导并求解城镇劳动者消费效用最大化可得: $y_{c_2}=\frac{\alpha_2 w_2}{p_c}$; 同理求解农村转移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的消费效用最大化可得: $y_{c_1}=\frac{\alpha_1 w_1}{p_c}$ 和 $y_{c_3}=\frac{\alpha_3 w_3}{p_c}$ 。因为: $y_{c_1}+y_{c_2}+y_{c_3}=y_c=A_1 k_c^{\beta_1}$, 可得: $\alpha_1 w_1+\alpha_2 w_2+\alpha_3 w_3=A_1 p_c k_c^{\beta_1}$, 同理可得: $(1-\alpha_1)w_1+(1-\alpha_2)w_2+(1-\alpha_3)w_3=A_2 p_A k_A^{\beta_2}$ 。消去 w_3 并化简可得:

$$w_1=\left(\frac{\alpha_3-\alpha_2}{\alpha_1-\alpha_3}\right)w_2-\frac{\alpha_3 A_2 p_A K_A^{\beta_2}}{\alpha_1-\alpha_3} \times L_A^{-\beta_2}+\frac{(1-\alpha_3)A_1 p_c K_C^{\beta_1}}{\alpha_1-\alpha_3} \times L_C^{-\beta_1} \quad (1)$$

从式(1)可以看出,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主要受城镇劳动力(非农劳动力)工资率、农业部门劳动力数量、城市部门劳动力数量的影响。

在以上经济行为模型分析基础上,依据式(1)设定计量模型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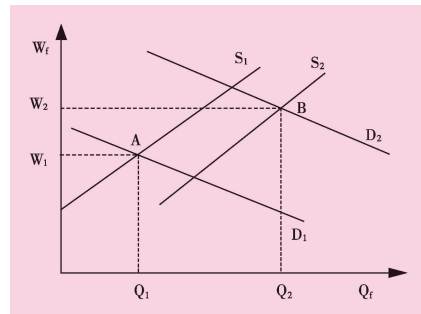


图3 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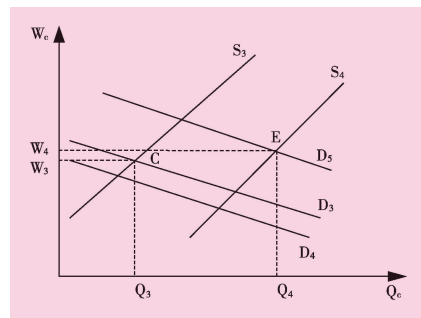


图4 城镇非农劳动力工资变化

$$w_1 = \alpha w_2 + \beta \times L_A^{-\beta_2} + \theta \times L_C^{-\beta_1} + \varepsilon \quad (2)$$

式(2)中 w_1 和 w_2 分别表示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和城镇劳动力(非农劳动力)工资, L_A 表示农业部门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 L_C 表示城市部门劳动力数量(包括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城镇劳动力), β_1 和 β_2 分别表示城市部门和农业部门的资本产出弹性, α 、 β 和 θ 分别表示城镇劳动力工资、农业部门劳动力数量和城市部门劳动力数量的系数, ε 表示误差项。

由于固定参数估计方法无法准确反映经济因素的动态变化情况,因而估计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和城镇劳动力工资之间的关系也不完全是线性的,为了更准确地观察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 w_1 和城镇劳动力工资 w_2 之间的关系及变化趋势,本文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法对式(2)中的系数进行估计。状态空间模型一般应用于多变量时间序列,包括信号方程(或量测方程)和状态方程(或转移方程)。以式(2)为基础,构建信号方程式(3)和状态方程式(4)。

$$w_{1t} = \alpha_t w_{2t} + \beta_t \times L_{At}^{-\beta_2} + \theta_t \times L_{Ct}^{-\beta_1} + \varepsilon_t \quad (3)$$

$$\alpha_t = \lambda_1 \alpha_{t-1} + \varphi_{1t}; \beta_t = \lambda_2 \beta_{t-1} + \varphi_{2t}; \theta_t = \lambda_3 \theta_{t-1} + \varphi_{3t} \quad (4)$$

式(3)和式(4)中, t 表示年份,可变参数 α_t 、 β_t 和 θ_t 为不可观测变量,可以表示为一阶马尔可夫过程,所以采用递归形式对状态方程进行定义。 ε_t 、 φ_{1t} 、 φ_{2t} 和 φ_{3t} 是独立同分布的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分析

(一) 数据来源、处理与描述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年鉴》和 1986~1999 年、2000~2009 年《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数据汇编》,时间跨度为 1980~2011 年。另外,2012 年 3~4 月我们在环渤海湾、长三角、珠三角和湘鄂皖 4 个区域就农村转移劳动力做了 600 份抽样调查问卷,筛选整理出 400 份有效抽样调查问卷^①,调查的主要对象包括建筑业和制造业中年龄较大的从业者和一般从业者,采用调查对象回顾以前工资的方法,得到其 1980~2011 年的工资情况,因为时间跨度太长,有些调查对象时间序列数据不全,所以采用指数平滑法处理缺失的数据^②。

① 选择环渤海湾、长三角、珠三角和湘鄂皖这 4 个区域就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抽样调查,是因为前 3 个区域是中国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主要输入地,而湘、鄂、皖是中国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输出大省,比较有代表性。

② 这种处理方法得到的数据准确性不够,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得到 1980~2011 年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特别是 1997 年之前的工资。

2. 数据调整和处理

《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缺少 1997 年以前数据,只能以近似数据代替。我们对 400 份调查问卷结果进行加权平均得到中国 1980~2011 年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平均工资,以此为基础,用《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公布的 1997~2011 年的农民工工资数据对调查数据进行修正,最后采用经修正后的调查数据,该数据得到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与宏观经济的走势和波动基本一致。

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的计算公式为:[农村人均工资性收入×户均人数/(农民工工资-农民工的基本生活支出)]×农村总户数=农民工数量^①,再用统计年鉴个别年份公布的农民工数据进行修正处理,得出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我们计算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提到的个别年份农民工数量有些差异,但除 2003 年外,误差均在 10% 之内,属于合理误差范围。另外,《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的数据是平滑增长,这不符合经济理论和事实,因为宏观经济走势是有波动的,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和同期劳动力转移年平均增长大约为 1:1 的关系(庾德昌,1989),而我们处理出的数据更符合宏观经济的走势和波动。因为农村转移劳动力基本都在企业工作,为了更具可比性,本文用城镇企业劳动力年工资代表城镇劳动力(非农劳动力)年工资。农业部门劳动力数量用第一产业从业人数代替。城市部门劳动力数量用城镇从业人数代替。

傅晓霞、吴利学(2006)估计了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中的资本产出弹性,得到 1978~2004 年全国各地区资本的边际贡献份额,由于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江苏、浙江是农村转移劳动力流入集中地,因此,本文选择这 6 个地区代表城市部门的资本产出弹性,然后把这 6 个地区的资本产出弹性加权平均得到城市部门的资本产出弹性为 0.73。赵建欣、张忠根(2007)通过 2004 年农业总量生产函数,计量得出 1985 和 2004 年农业资本产出弹性分别为 0.8939 和 0.8146。考虑到 1980~2011 年农业资本的产出弹性是下降的,在没有更准确数据的情况下,本文用 2004 年的农业资本产出弹性 0.81 代替 1980~2011 年的农业资本产出弹性。

3. 数据描述分析

从图 5 可以看出,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和城镇劳动力工资差距在 20 世纪 80 年代比较大,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均值仅为城镇劳动力的 69.16%;但从 1989 年开始,差距急速缩小,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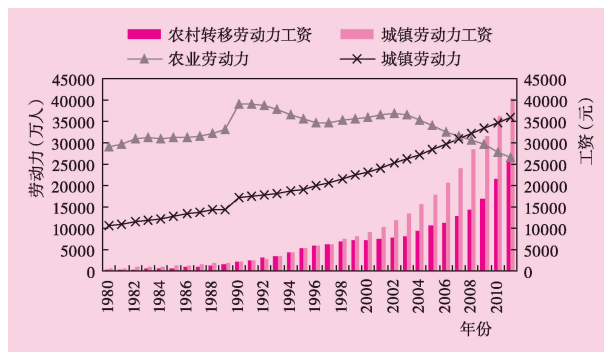


图 5 1980~2011 年劳动力数量及平均工资水平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整理。

^① 中括号内为农村户均农民工人数,其中分子为农村每户工资性收入,分母为农民工人均汇回农村的工资。

9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工资甚至超过了城镇劳动力,1990~1997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均值是城镇劳动力的100.43%。然而,自1998年开始,二者工资差距又逐步扩大,1998~2003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均值仅为城镇劳动力工资的73.66%,从2004年开始,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加速上升,特别是自2007年以后,其增速超过了城镇劳动力工资增速,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又开始逐步趋同于城镇劳动力工资。

(二) 实证结果

用卡尔曼滤波法,得出的式(3)和式(4)的估计结果如下^①:

$$w_{1t} = 0.6862w_{2t} - 0.0470 \times L_{At}^{-\beta_2} + 0.1783 \times L_{Ct}^{-\beta_1} \quad (5)$$

$$\alpha_t = 0.9871\alpha_{t-1}; \beta_t = 0.9985\beta_{t-1}; \theta_t = 0.9991\theta_{t-1} \quad (6)$$

参数估计结果显示,各参数的Z统计量都处于1%的显著水平,P值均小于0.05,模型拟合优度为0.9017,DW检验值为1.78。状态空间模型信号方程的平稳性检验显示,考虑趋势项和漂移项时,伴随概率为0.0088,ADF统计量是9.1652;不考虑趋势项和漂移项时,伴随概率为0.0931,ADF统计量是5.0261。因此,状态空间模型的残差是平稳的,不存在伪回归问题。

从图6可以看出,在1980~2011年的绝大多数年份中,城镇劳动力数量与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呈正向关系,表明城镇劳动力需求数量的增加造成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的上升,同期多数年份农业劳动力数量与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呈反向关系,表明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引起了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的下降。在此期间仅1983年和1988~1994年少年份城镇劳动力数量与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是反向关系,农业劳动力数量与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是正向关系,这可能与1988~1994年高通货膨胀引起的经济数据失真有关。

在控制农业部门劳动力数量和城市部门劳动力数量这两个变量后,城镇劳动力(户籍居民)工资的估计系数在1980~1987年都小于1,部分年份甚至为负,表明农村转移劳动力

工资与城镇劳动力(非农劳动力)工资的差距较大;1988~1994年,估计系数都大于1,这表明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已超过城镇劳动力工资;1995~2003年,估计系数小于1,且呈缩小趋势,表明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与城镇劳动力工资的差距在逐渐扩大,但到1997年工资差距都不大,从1998年开始工资差距才迅速扩大;2004~2011年,估计系数又开始逐步变大,表明二者的差距又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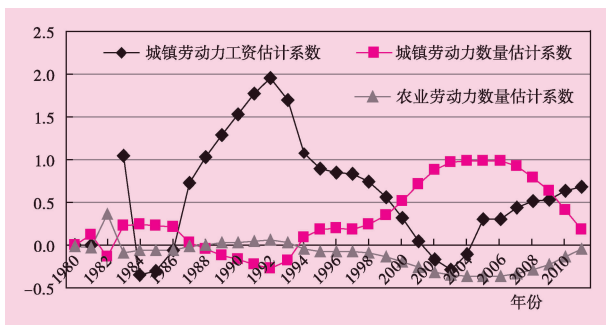


图6 估计系数的变动趋势

注:由于1982年城镇劳动力工资估计系数过小,图中未列示。

①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给出了信号方程的最后一期估计结果。

逐步缩小,并有逐步动态趋同的趋势。本文根据估计系数的变化趋势为主结合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及重大宏观经济事件的发生,分 1980~1987 年(改革开放前潜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滞后影响)、1988~1997 年(20 世纪 80 年代中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滞后效应影响)、1998~2003 年(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和 2004~2011 年(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的滞后影响)4 个时间段分别讨论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与城镇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变化情况。

第一,1980~1987 年,这一阶段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与城镇劳动力工资的差距很大。主要有供求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以 195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为标志,政府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把农民限制在农村,控制农民流入城市,同时,农村人口增长很快,从 1958 年的 5.53 亿人增长到 1980 年的 7.95 亿人,近 8 亿农民几乎都被束缚于农村,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村隐性失业现象严重,存在大量潜在剩余劳动力。因此,当 20 世纪 80 年代初政府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公安部门应允许符合条件的农民和家属在城市落户,对人口流动管制放松以后,长期被压制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的流向城市。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城市和工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需求有限,在供过于求的约束下,城市部门只需提供略高于生存所需的不变制度工资,就能吸引大量农村转移劳动力,此时为劳动力转移的第一阶段(无限劳动供给阶段),资本稀缺但劳动力丰富,农村剩余劳动力存在无限供给趋势。

第二,1988~1997 年,其中 1994 年之前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超过了城镇劳动力,1995 年以后尽管前者工资低于后者,但直到 1997 年二者差距都不大。原因可能在于,1984 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在生产经营计划和产品销售等十个方面,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开始推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92 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两次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出的制度红利,使中国经济快速增长,除 1989 和 1990 年因治理、整顿导致 GDP 增长较低之外,其他年份 GDP 都高速增长,1987 和 1988 年 GDP 年均增速达到 11.5%,1991~1996 年年均 GDP 增速达到 11.9%,因此,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长,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也大幅上升。同期城镇劳动力工资改革滞后,工资增长缓慢甚至低于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

第三,1998~2003 年,此阶段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和城镇劳动力工资差距迅速扩大。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遭受打击,特别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密集的出口加工业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1997~2001 年中国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 8.66%,1998~2003 年年均 GDP 增速下降到 8.53%,中国经济经历了 5 年的通货紧缩。这些因素造成对农村转移劳动力需求减少,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增长非常缓慢,增速仅为 3.73%,然而,同期城镇劳动力工资增速却达 12.89%,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和城镇劳动力工资差距又开始迅速拉大。

第四,2004~2011 年,此阶段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上升很快,但计量结果却显示,尽管

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与城镇劳动力工资的差距开始缩小,但缩小幅度仍不是很大。这是因为:(1)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出口连续多年增速保持在30%左右,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迅速成长壮大,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中国经济从2002年开始进入了新一轮增长周期,从而导致劳动力需求迅速增长,各地出现了“民工荒”;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经过多年的持续稳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此外,政府对农业加大补贴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农村转移劳动力外出务工机会成本提高。这些因素都可能促使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的迅速增长。(2)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增长很快,城镇劳动力的年均工资增长率也很快。只有2006~2011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年均工资增长率达到18.09%,大幅超过城镇劳动力的年均工资增长率14.94%,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才开始加速趋同于城镇劳动力工资。

四、结 语

本研究结果显示:(1)1980~1987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与城镇劳动力工资的差距较大;(2)1988~1994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一度高于城镇劳动力工资;(3)1995~2003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与城镇劳动力工资的差距逐渐扩大,但1997年之前工资差距不大,1998年以后工资差距才迅速扩大;(4)2004~2011年农村转移劳动力与城镇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又开始逐步缩小,说明二者工资有逐步趋同的趋势。

这一现象将会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是:(1)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成本提高,将削弱产品出口竞争力,传统低附加值制造业将难以为继,使中国出口难以继续高速增长,因此,企业必须转向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以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企业核心竞争力。(2)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会减少企业投资回报率,致使企业投资更加谨慎,抑制企业投资冲动,这一方面将使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考验,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3)农村转移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会减少农村居民的流动性约束,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出口拉动型转向内需拉动型。

参考文献:

1. 蔡昉、都阳(2011):《工资增长、工资趋同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学动态》,第9期。
2. 丁守海(2011):《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与工资上涨》,《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3. 傅晓霞、吴利学(2006):《全要素生产率在中国地区差异中的贡献:兼与彭国华和李静等商榷》,《世界经济》,第9期。
4. 约翰·奈特等(2011):《中国的民工荒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管理世界》,第11期。
5. 庾德昌(1989):《全国百村劳动力情况调查资料集》,中国统计出版社。
6. 赵建欣、张忠根(2007):《要素投入结构变化对中国农业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技术经济》,第7期。

(责任编辑:李玉柱)